



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，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科学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。



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。

安特生极为兴奋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发掘的工作中去。这样的考古工作，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、了不起的开始，这一发现是革命性的。安特生证明了在今日中国这个地方确有史前史的存在。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回顾中国考古学史时曾经说过，安特生发现这“前所未有的早期中国文化后，关于它跟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”。安特生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还带来了比过去广阔得多的视野。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，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科学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，它的出现推翻了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。

除此之外，安特生同时也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。

1918年2月的一天，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·吉布。后者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，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，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。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。1918年3月，安特生骑着毛驴，到周口店，并考察了两天。

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发掘，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，啮齿类的数量

很多。当地老乡之前并不认识动物骨骼化石，误认作鸡骨，因此这座小山得名“鸡骨山”。

1921年初夏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了中国。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，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。在一次考察中，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。他认为，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，用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。那么，它们会不会被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？

1926年夏天，当安特生在瑞典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，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。1926年10月22日，在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，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。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分歧，但这消息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，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，即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，都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古老的人类化石。安特生因仰韶文化和北京猿人的发现，在中国的考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谁是“中国考古之父”

五四运动后，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“整理国故”思想的影响。一批学者主张用历史演进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，吸收西

方近代社会学、考古学的方法，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，形成了“疑古派”（又称“古史辨派”）。其中，以顾颉刚为代表。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《与钱玄同论古史书》，到1926年《古史辨》第一册问世，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。这一学派对上古历史提出了强烈质疑，堪称“疑古派”的“旗手”顾颉刚更是提出了“东周以前无信史”、“夏商皆伪史”的论断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。

1928年，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研究部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傅斯年任第一任所长。1928年，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发掘。次年春天，从晋南西阴村等地考古归来的李济，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，正式接任殷墟发掘负责人。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组织的第一次田野发掘。而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则证明，商代确实存在。

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童心教授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采访时认为，顾颉刚的疑古派对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其实是起到比较大作用的：“这是当时的各种条件促成的，在上个世纪初，顾颉刚等人开始质疑史料，是对历史学根本性的颠覆。在考古学产生之前，中国的学者都是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。如何来证明或者证伪顾颉刚的观点呢？正好这时候西方的考古学进入中国，它能够回答中国古代的人是怎么样的，顾颉刚的疑古派只是指出中国古史是有不合理的地方的，但是合理的部分他们没有指出来。他认为大禹是条虫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大禹时代中国人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，他们的文化面貌是怎么样的。正好使得考古学科传入中国不久就被